



将军的脚步

解放军出版社

将 军 的 脚 步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北 京

责任编辑：朱冬生

封面设计：姜学亮

225

将 军 的 脚 步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零一工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7⁴/₃₂ 印张·151,000 字

1984 年 5 月第一版 1984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5·43 定价：0.75 元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毛泽东、朱德同志在北京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委王平。

目 录

忆挚友杨勇.....	宋任穷	1
我的思念.....	杨得志	3
相识在红军年代.....	甘渭汉	7
杨勇送我一头小毛驴.....	王六生	13
杨勇同志在长征中.....	李 由	18
杨勇同志在冀鲁豫.....	段君毅 赵健民 徐运北 张承先	25
战斗的一生.....	赵健民	30
怀念杨勇.....	曾思玉	50
抗日烽烟中的杨勇同志.....	欧阳文	56
记杨勇同志.....	戴润生	77
从晋西到鲁西.....	曾宪辉	85
梁山聚英杰 风雨扶危舟.....	田 兵	88
忆杨勇团长.....	杨国栋	105
沙场骁将 战功卓著.....	潘 焱	112
杨勇同志在解放战争中.....	吴 实	119
杨勇与五兵团的政治工作.....	薛 光	126
“三道拐”遇险记.....	郭兆杰	138

忆杨勇同志·····	王 平	143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李志民	147
丹心永存照人间·····	廖汉生	158
杨勇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	李 炎	160
丹心耿耿 铁骨铮铮·····	郭林祥	164
学习的楷模·····	谭友林	169
新疆各族人民的怀念·····	司马义·艾买提	172
杨勇同志在新疆工作的片断·····	曹达诺夫	180
民族工作的模范·····	贾那布尔	185
杨司令员在新疆·····	王步苍	193
为加强战备和军队建设战斗到最后一息·····	王尚荣	197
怀念杨勇同志·····	黄克诚	208
留得正气铁骨香·····	张爱萍	209
革命见精神·····	傅 钟	210
长征勇突四重围·····	郭化若	211
风范长存松柏苍·····	欧阳文	212
后死更当自奋起·····	魏传统	213
将军的脚步		
——怀念杨勇同志，填词五首·····	阎学增	214
芭茅草散记		
——记杨勇同志·····	贺兴桐	220

忆 挚 友 杨 勇

宋 任 穷

一九三四年，我在中央直属干部团任政委，杨勇同志是红三军团中一名优秀的团政委，我们一起跋涉千山万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我初次和杨勇同志共事，是在抗日战争后期。一九四四年五月，冀南和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我和杨勇同志一起在军区工作。我们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在抗击日寇的战火中同生死、共患难，度过多少个难忘的日日夜夜。一九四九年，我们又一起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挺进大西南。杨勇同志率二野五兵团西取贵州，陈赓同志和我率二野四兵团南下云南。全国解放后，我们先后奉调北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结下的革命情谊，经常互相看望，促膝谈心。

杨勇同志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人，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思想品德。他坚定、坦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团结同志的领导艺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杨勇同志胸怀开阔，性格爽朗，对党的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是一位坚强的乐观主义者。不论平时还是战时，

也不论是在顺利的环境里还是在艰难的逆境中，他总是乐呵呵的。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时时鼓舞着周围的同志，给人以无形的力量。直到癌症晚期，身体极其衰弱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这种革命的气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我到医院探望他。在谈话中，他同往常一样乐呵呵地对我说：“医生讲，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还有一个月。”说话的神情完全不象一个垂危的病人。他谈完病情之后，就同我谈起工作问题，讲了他对工作的一些意见，他念念不忘的是党的事业，特别是军队建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勇同志表现得如此坦然自若，把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真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一个坚定的、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一走出病房，泪水便夺眶而出。

杨勇同志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领导人，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迁就，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同时，他又很尊重同志，能够虚心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待人宽厚，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哪怕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反对过他的同志，他都能合作共事。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杨勇同志的工作时有调动，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岗位，他都能够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勇同志和其他同志有过不团结的现象。既能坚持党的原则，又能广泛团结同志，这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和领导才能。杨勇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杨勇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赢得了广大军民的爱戴和崇敬。

我的思念

杨 得 志

早在中央根据地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我就听说杨勇同志是红三军团中年轻而又优秀的团政治委员之一。我们在同一个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作战，在同一条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行军。直到一九三六年，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征胜利回师后，在陕北召开的一次团以上干部会上，我才第一次认识他。这之后，抗日战争参加平型关大战，开辟和坚持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几个重大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的日日夜夜，特别是近几年在总参谋部，我们可以说是并肩战斗，朝夕相处。杨勇同志比我小两岁，几十年来，他习惯唤我“老杨哥”。当我意识到再也听不到他那真诚、亲切、充满战友情谊的呼唤时，真是心胆欲裂，热泪难止。杨勇同志，我的老战友，好同志，你离开我们太早了！

杨勇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鞠躬尽瘁为人民的一生。他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是我军战功卓著的高级指挥员。他党性强，有魄力，有才华，是一位军政双优的军队领导者。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军队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党把他放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发挥自己

的作用。他作主官，敢于负责，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作副手，兢兢业业，尊重同志，维护党的集体领导。有了成绩，归于党和集体，归于群众；有了问题，他主动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宽宏大度。在他的心目中，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毛泽东同志曾说，杨勇是个很能团结人的同志。的确如此。他大公无私，维护集体，顾全大局，在形势紧张和危急的关头尤为突出。记得抗战初期，在山东东明县的一次战斗中，他指挥的鲁西军区部队，同我们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另一支兄弟部队一起反击顽军。我带部队攻入纵深地区后，由于另一支兄弟部队撤出了战斗，我部处于被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杨勇同志挺身而出。他对我说：“你放心，不胜利我决不撤出战斗，我们一块打！”在他率部主动配合下，打垮了顽军。人们知道，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彭总回国后，由我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同志是副司令员。其实，我在国内接到任命，组织上同时确定我到军事学院去学习，志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担子，是由杨勇同志担负着的。他忠诚地履行了党和祖国人民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血与火的共同斗争中，与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杨勇同志一心致力于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经常不辞辛苦，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一九八〇年春，我到总参工作后，我们曾一起到祖国的西北、华北、东北、西南和海南岛、西沙群岛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去西沙群岛时，他首先想到带一麻袋中南海的土，送给守卫祖国宝岛的战士们。他看到岛上树木很少，提出要每个战士每年种三棵椰子树，并且立即亲自动手和同志们一起栽培树木。他十分关心西沙群岛的建设，详细

询问了解指战员们的生活情况。记得离岛的时候，战士们恋恋不舍地对我们说：“希望首长再来！”杨勇同志乐观、爽朗地回答：“一定再来看大家！”我们约定今年春天再一起到部队去看看。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却与世长辞了，想来驻守西沙的指战员们一定和我的心情一样，这怎么不使人悲痛呢！

杨勇同志在总部工作多年，对于总参谋部的建设付出了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他总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他带头执行《准则》，为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而身体力行。“文化大革命”中，杨勇同志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在失去自由的艰难困境中，坚信胜利，坚持斗争，他那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高贵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他作为总参党委的第二书记，带头执行党中央的各项决议。在拨乱反正中，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平反冤假错案，清除“左”的影响，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杨勇同志是一位坚强、乐观的革命者。去年春天他发病以后，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下，很快采取了有力的治疗措施，病情明显好转，恢复得不错，我们都很高兴。我曾劝他下决心休息一年，他却执意不肯。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幸存者，活着就得拚命干！”他以高昂的革命精神，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他出席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坚持总参的日常工作，为总参机关的党员上党课，直至入医院前，还在总参党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对全军和总参机关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入院后，他

的病情虽然不断恶化，但一直保持着革命者大无畏的乐观主义情绪，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我几次去探望他，他总是说：“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不要为我分散精力了。”后来他的病情严重恶化，讲话都困难了。他吃力地对我说：“告诉医生不要再用药了，不起作用了，那是浪费，不要再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一月五日下午，传来了杨勇同志病危的消息。我立即赶往医院，医务人员正在紧张地抢救，他已经失去了知觉，连人也认不清了。我站在他的面前，纵有千言万语，再也说不出口来。当晚，我处理完一天的工作，久久不能入睡。凌晨一时四十分，秘书同志来敲门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我再次赶到医院，我的老战友、好同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相识在红军年代

甘渭汉

一九三一年，杨勇同志在红三军团二师政治部任政务处长(做保卫工作)，我任组织科长。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杨勇同志浓眉毛，大眼睛，高高的个子，真是“少年英气扑人眉宇”。

杨勇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听杨勇同志说过，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还是个童子团，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和农民自卫队一道，打土豪，破迷信，检查烟赌。对胆敢反抗的土豪劣绅，就把他捉来，戴高帽子游街。有一个叫彭老五的大地主，就被杨勇他们捉住游过街。一九二七年杨勇同志十五岁时，随浏阳工农义勇队参加了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壮举。同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从这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党出版的刊物《中国青年》和团支部发的油印本《马克思主义浅说》。这给年轻的杨勇同志灌注了革命思想。攻打长沙失败后，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到处是捉“暴徒”的白色恐怖。一些不坚定的人，有的自首，有的外逃，有的回家。但杨勇同志毫不动摇，坚持斗争，千方百计地找红军，找党。有一次，他从

报纸上看到彭德怀同志领导平江暴动，在平江、浏阳等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消息，就参加了浏阳县第八区苏维埃政府工作。当时这个区的力量很小，只依靠一个仅有七条枪（还有一条枪不能用）、十多人的游击队，每夜都要移动，经常被赶到江西修水、铜鼓和浏阳交界的大山中。在艰苦的斗争中，杨勇同志十分坚定。后来他们发展到有十八条枪、四十余人的游击队。在那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击革命力量，对游击队家属进行残酷迫害，杨勇同志的两个哥哥被逼得流落他乡。但这并没有吓倒杨勇同志，反而更加激发了他对反动派的仇恨，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一九三〇年，杨勇同志参加红军。杨勇同志常说：“我唯一的依靠，就是革命队伍。”

在江西反“围剿”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但杨勇同志性格豪放，情绪乐观。他和同志们不分彼此，亲密无间，有打有闹，有说有笑。那时候，大家都有一身用不完的劲，在工作之余或行军休息，就打闹一阵子，好象一、两天不打闹就过不了日子似的。在行军中，杨勇同志有马不骑，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或给干部、战士驮东西。在行军又累又饿的情况下，杨勇同志总是跑前跑后，帮助战士抬担架，帮助体弱的同志背枪，背背包，有时肩上背三、四支枪，同志们都说他象个“骆驼”。当时，蒋介石对根据地的封锁很严，红军吃盐成了大问题。谁能弄到斤把盐，那是很宝贵的。实在弄不到盐时，我和杨勇等几个湖南人，就吃辣椒下饭。我们将辣椒放在火上烤一烤，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满香。那时候，同志们手里都没有钱，但是共产主义风格都很高，同志之间吃的、用的、穿的都不分彼此。比如我的衣服烂了，他有一件衣服，我就可以拿来穿。平时发

的零用钱和伙食尾子，在打仗前，大家就拿出来请客，谁拿钱谁就当“主席”，这次他当，下次你当。我们都不抽烟，也买不到生活上用的一些东西，所以有了零用钱，就买东西吃。比如买一只鸡，买几条鱼，炖一炖，装一脸盆，大家围着吃，边吃边说：“吃吧，明天要打仗了，要跟敌人拚呀！”杨勇同志有东西，总是主动给大家用，发了钱，总是主动给大家买东西吃。熟悉杨勇同志的人，都说他是革命的乐天派。

早在江西反“围剿”时，杨勇同志就表现了他军政双优的才能。杨勇同志参加红军不到半年，因为他上过中学，有文化，年轻活泼，口才流利，在平江成立红八军时，就被选调到政治部宣传队当分队长，后任宣传队长。当时的宣传队，既要宣传群众，扩大红军，又要做好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打起仗来，还要进行火线喊话，瓦解敌军。杨勇同志很热爱这项工作。部队打了胜仗，抓了俘虏，缴获了战利品，他们就及时印成传单，宣传胜利消息！部队行军，杨勇同志就带领宣传队做宣传鼓动工作。队伍爬山，就会看见他们在半山腰上或山顶上的路旁，插着小红旗，呱嗒呱嗒地打竹板，嘴里唱着：“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部队行军休息，他们跑前跑后，到处拉歌子，使战士们行军不感到疲劳。打仗的时候，杨勇同志总是带领宣传队出现在战斗的最前线，冒着弹雨，擎着用硬纸壳或薄铁皮作成的喊话筒，用宏亮的嗓音向敌人喊话：“白军兄弟，不要给反动军官、地主、资本家卖命！”“过来吧，我们官兵平等！”这种敌前喊话，对瓦解敌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杨勇同志任三军团四师十团政委时，就是有名的年轻

优秀的团指挥员之一。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以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三军团在洵口与敌一个师遭遇，歼敌三个团（缺一个营）。在这次战斗中，杨勇同志因作战勇敢，政治工作做得好，曾获得第二届全苏维埃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我军放弃广昌之后，一九三四年夏末，三军团奉命在广昌以南石城以北地区组织防御，节节抗击向我中央根据地逼进的国民党军汤恩伯和樊松甫的两个纵队。杨勇同志率领十团在这一带打防御战。当时，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一次推进四、五华里，堡垒筑成后，站稳了脚跟，再向前推进；同时，对根据地严密封锁，提出什么“抽干池塘水，再捉池塘鱼”。我军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提出的口号是“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打法是“以堡垒对堡垒”，“顽强防御，短促突击”。因此，部队每到一地部署好后，首先就是构筑工事。指战员们将树木作为工事的顶盖，埋上泥土、柴束、石头，堆得象个小山头。各阵地之间有交通壕互相连接。工事外围还埋有竹钉、鹿砦，有时还利用陡坡挖峭壁。就这样，与敌军“以堡垒对堡垒”地对峙着。有的地方，两军阵地只隔四、五百米，有的连队阵地与敌人只隔了一个小山沟，敌人喊吃饭、修工事的声音都可以听到。杨勇同志就号召指战员利用这个条件，向敌人喊话，瓦解敌军。这种“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使我军消耗很大，弹药无法解决，杨勇同志就派出战斗小组，夜间到敌人遗弃的尸体上搜集弹药。敌人进攻时的炮火很猛烈，天上飞机炸，地上大炮轰，我军的许多工事和支撑点被打坍了，部队伤亡比较大，为了保证部队指挥不中断，

杨勇同志所在的十团，及时调整干部，实行“火线代职”，大家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战斗决心，坚守阵地。有一天，杨勇同志得知敌人的主攻方向可能转向防守在蜡烛形高地的三营时，及时提醒当时担任该营营长的张震同志，要他们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并果断地从其他营抽调一挺轻机枪支援三营，加强前沿火力。战斗打响后，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是“左”倾路线造成的，而英勇奋战的指战员，是无愧于红军战士这个光荣称号的。

杨勇同志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勇于作自我批评，很值得我们学习。一九四七年，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下，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时，杨勇同志任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大别山，远离后方，最大的困难是供应问题，尤其冬季到了，制作棉衣成了大难题。上级要求“就地购买材料，自行缝制棉衣”。杨勇同志和几个领导干部商量，提议实行过去打土豪、罚款的办法，弄到做棉衣的材料。在实行过程中，发现在政策上有毛病。事后，杨勇同志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此点是以我为主提出的，虽经上级批准，我应负主要责任。”一九八〇年初，总参谋部为调进调出几位领导同志，在京西宾馆开迎送会时，吃了宴请饭，看了电影，两项花费四百余元，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杨勇同志主动承担了责任，自觉向上级写了检查报告，所有花费由他个人全部交付，并建议将此事通报全军。杨勇同志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军广大干部受到深刻教育。杨勇同志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

杨勇同志和我都曾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